

哈尔滨文史资料第25辑



史海存真

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黑新出图内字 A(2003)016 号

装帧设计：董 森



史海存真

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史海存真》编委会

主 任：姚建亭

委 员：李素荣 章 同 王 云 原红十

主 编：李素荣

副主编：章 同 王 云

责任编辑：原红十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内部资料性图书一次性准印证

书 名 史海存真

编写单位 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承 印 厂 哈尔滨科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3年10月29日 印数 1000册

开本：大32 字数：22万 印张：11

黑新出图内字 A(2003)016号

序 言

任何门类的科学其最直接、具体的目标都是对真理的追求,历史科学也寓于其中。具有史料性质的文史资料在历史科学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其最基本的要义是真实,惟有真实才有生命力。文史资料的真实性似乎是与生俱来,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如果浏览下《史海存真》这本文史资料专辑,就可以发现文史资料工作犹如一束光,在这束光的摩挲中,被埋在黑暗里的史料渐渐地现出了她的真相。根据惊天地泣鬼神的东北抗日联军“八女投江”素材,创作摄制的电影《中华女儿》,荣获1950年第五届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之后,有关“八女投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八位女烈士的姓名、具体的战斗情节仍然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经过艰苦细致的采访多位知情者、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调查和缜密的逻辑分析,终于将“八女投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散落各处的零星资料,凝结成为历史自身的纪念碑,帮助历史舒出那口郁积已久的浩然长气!

《史海存真》这部文史资料专辑,收集的资料主要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使很多史料无法完整的保存下来,是众多的文史资料工作者修补了史料的缺憾。文史资料作为史料家族的成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在历史确凿史实坚硬的河床上实现文史资料的大河奔流。这部《史海存真》集录的各篇文史资料的作者,在史海求真的奋斗中成就为成功的弄潮者。从史海求真到史海存真,先“求”后“存”,在“求”与

“存”的转化过程中不知凝结了多少心血,不能不让人想到,历史是前人留给我们的财富,但要准确恰当地运用这笔财富却需要后人的努力和智慧。

真实无华的历史具有怎样的力量?在本书中有这样的情节,战犯管理所组织日伪战犯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时,这些战犯都自动地跪在英烈面前,敬服认罪。这真实的一幕已远远超过罪与非罪和历史真实自身的范畴,转向道德评价的标准:善与恶。“恶”终于跪在“善”脚下。另一方面,修正错误追求历史真实的文史资料工作者,是内心起码的道德要求,使其在追求史海存真的实践活动中有了推之不去的历史责任感和敏锐的历史目光。爱因斯坦和杨振宁两位伟大的科学家都把真理与“美”联系在一起。从小的方面说,当文史资料工作者战胜各种困难使史料得到证实时,会引起内心精神世界的愉悦,从而产生美感;从大的方面谈,人类在真和善的追求中所积累的历史文明成果已融汇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进而转化为普遍的审美能力,其中包括审美趣味、审美观点。中国古代哲学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认识论意义上“真”的求证是实现认识功能的基本准则,没有“真”的认识价值,教育功能的“善”和审美功能的“美”都无法真正实现。只有“真”能为雄伟的大厦奠基,为广宽的通衢剪彩。

编者

2003年10月

目 录

序 言	编 者(1)
五封尘封的抗联书信查考	郭肇庆(1)
三颗英烈遗首的来历和去向	温 野(17)
杨靖宇即马尚德的再考证	赵俊清(25)
周保中的传奇斗争岁月	刘文新(37)
赵尚志将军殉国地的查实认定	温 野(71)
随季青到抗联游击根据地实录	刘文新(79)
“八女投江”事迹查实	温 野(97)
爱国女护士韩永义反日事迹查证	温 野(124)
通河县抗联密营遗址考察	赵文信(137)
高清富与清河北山地下交通站	王志民 赵文信(157)
方正第一任县委书记刘兴亚事迹调查	杨兴江(163)
抗联将领郑洪涛的史料搜集	杨兴江(170)
不能忘记他们 ——协助调查高庆有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经过	张福山(177)

父辈在这里留下的足迹

- 我所知道的哈尔滨牵牛坊 冯 羽(186)
- 王岗伪满第三飞行队起义经过 温 野(190)
- 追记通河“四·六”起义领导人王金财的英雄事迹
..... 赵文信(203)
- 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旧址实地考证 张福山(221)
- 哈尔滨学生“一一·九”抗路游行受伤人数查证
..... 王 云 王友兴(226)
- 哈尔滨日本领事馆被炸之迷 张福山(233)
- 伪满“建国纪念碑”上书写反日标语的考证 张福山(236)
- 调查整理中共通河特支领导的农民斗争情况 赵文信(243)
- 征集史料时引发的一封“读者来信” 张福山(252)
- 王里封烈士追认记 张福山(256)
- 尚志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情况调查 隋 楨(267)
- 杨子荣智擒“座山雕”及牺牲和故里确认的调查 ... 温 野(278)

五封尘封的抗联书信查考

郭肇庆

1980年夏,我去档案馆查阅资料,偶然发现了五封书信。读完它的内容,令我惊异和难以言表的兴奋与喜悦,因为我读到的这五封尘封已久的书信,并非普通的信件,而是与一段光辉的历史有关,并且是这段光辉历史中两位英雄——杨靖宇和魏拯民的书信。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杨靖宇和魏拯民之间唯一的化名书信。它不仅向我们显示了这种秘密通信形式的存在,而且也向我们展示了1939年末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使我们对杨靖宇将军在1940年2月23日遇难前几个月间第一路军总部领导者的活动情况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因此,这五封信的历史价值尤为重要。这也就是我之所以为它的出现感到惊异和喜悦的原因。

这五封信是:

1939年10月1日董介南写给陆鸣一、马天一的信;

1939年11月×日董介南写给陆鸣一的信;

1939年12月×日董介南写给陆鸣一的信;

1939年12月17日马天一写给陆鸣一的信;

1939年12月26日马天日^①写给陆鸣一的信。

现在,我就把这五封信的面貌、信的署名和信的内容分述如下:

信的面貌

由于信的原件保存在档案馆里,当时没有复印的条件,我只能把它抄录下来,因此,现在无法把信的面貌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仅能凭我手中的抄件做简单的叙述。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五封信均已被火烧过,残缺不全,无法看清楚它的全部内容。其中三封信有头有尾(即有写信人和收信人姓名),但正文残缺,多处文字和语意不连贯,无法弄清全部意思;两封信仅存结尾部分和写信人姓名,残缺尤为严重,有一封信仅剩下结尾部分的四五行文字,亦是断断续续,难以辨识其全意。

其次,信中的写信人董介南、马天一(日)和收信人陆鸣一都是化名,而非真实姓名。因为在抗联第一路军的高中级将领中并不存在这些名字。从信的内容分析判断,我认为这三位化名的人应该是抗联第一路军政治委员兼副总司令、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化名董介南]、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化名陆鸣一]、抗联第一路军后勤处长金光^②[化名马天一(日)]。对于化名的解释或考证,我将在后面详述。

还要指出的是,这五封信全部是日文,而非中文。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既然这五封信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最高领导者之间的通信,为什么信中的文字不是中文而是日文呢?我认为,这件事是可能跟一个人的投敌叛变有关。

① 马天日与马天一为同一人。

② 金光于1941年1月29日在抚松县高陞屯投敌。

作为中国的一支抗日部队的高级将领,在相互通信这一高度军事机密的行动中,使用中文是天经地义的,相反,不使用本国的文字反而使用敌对国的文字——日文,则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它不仅违背了常规,也不符合军事保密的要求;况且杨靖宇和魏拯民二人根本不懂日文。两位根本不懂日文的抗日将领,又怎么能拿起笔来用敌对国的文字给对方写信,讲述军事机密,这岂非咄咄怪事!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五封信绝非原件,它是经过日本人之手由中文译成日文的。至于它是怎样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的,这就不能不提到那个叛变者。

这个叛变者名字叫做张秀峰。他曾经是杨靖宇的警卫排——机枪排排长,在担任警卫任务的同时,还负责杨靖宇的机要文件和总部一部分活动经费的保管任务。1940年2月1日,杨靖宇率领一支小部队秘密进行在濛江县(今靖宇县)北部那尔轰西方的山区,在一处高地和日本“讨伐队”遭遇,激战中,张秀峰逃跑了,随后投敌叛变。

张秀峰叛逃时带走了9960元巨款、4支短枪和一批机密文件。从时间上推算,杨靖宇收到魏拯民于1939年10月1日发出的信,到张秀峰携带文件投敌,相隔不到四个月,而收到全光1939年12月26日的信,到此时相距仅两个月有余,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张秀峰叛变带走的那批机密文件中,包含着上述的五封信是毫无疑问的。正是由于这个变节者的投敌,才使这五封书信落入敌手,并将其全部译成了日文。

张秀峰叛变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危害和罪恶,是他向敌人提供了一个比那批文件更为重要的机密,那就是敌人使尽浑身解数想要获得而始终不曾得到的关于杨靖宇的行踪及其身边部队的情况。张秀峰在这个关键时刻出卖了杨靖宇。22天后,即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县县城附近遇难。

信的署名

前面讲过,五封信中有一封是董介南写给陆鸣一和马天一的;有两封是董介南写给陆鸣一的;一封是马天一写给陆鸣一的;另一封是马天日写给陆鸣一的。这四个名字实际上是三个人,因为马天一和马天日为同一个人的两种称呼。信中的内容表明,这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高级将领间汇报工作、交流情报的通信。然而,在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高级将领,甚至包括中级将领中间并没有叫董介南、陆鸣一、马天一(日)的人,毫无疑问,这三个名字是为了保密而采用的化名。因此,弄清这三个化名者的身份及其真实姓名,对于确定这五封信的真伪及其价值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由于这五封信中的化名是第一次发现,在现存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信息,在诸多抗联老同志的回忆中也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想要把它们准确无误地解译出来,有很大的困难。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信件本身所提供的依据,而且这是唯一可靠而真实的依据。

董介南是五封信中三封的具名者。他的这三封信在数量上居于多数,在内容的含量上也比其它两封信较为广泛。虽然这三封信被火烧得最为严重,但残留下来的支言片语却仍然保存着较多的可以解译董介南身份的依据,为弄清董介南的身份提供了可靠而有力的证据。这是解译五封信化名的关键。只要解译了董介南这个化名,其他两个化名的解译也就较为容易了。

一、董介南是谁

董介南在他的三封信里,向我们透露出有关他身份的三条重要依据。这就是:他的身体状况;他和部队的关系;董介南这个化名的秘密。

他的身体状况

他在10月1日给陆鸣一、马天一的信中写道：“我的身体愈益衰弱，除了吃饭以外，连小解也感到难受，在平坦大道上虽勉强能走几里，但在上坡时走到50步左右就不行了……^①我想离开其他同志，带领特务排的18位同志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去静养。”在12月×日写给陆鸣一的信中，他又这样写道：“我的身体现在糟透了，吃了饭，晚间睡觉翻动身体都颇感劳累，好像断了气似的。从汉窑沟^②到我们自造小屋不过50里，跋涉了□日好不容易才到达。”

这两段文字充分说明，董介南本人患着严重的疾病，而且病情日益加重，就连小解和睡觉时翻身都感到“劳累”。那么，在抗联的高级将领中，有谁曾经患过如此重病呢？熟悉抗联历史的人当不会不知道，在抗联的高级将领中，患得如此重病的独有一人，他就是第一路军政治委员兼副总司令、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除了他别无二者。

魏拯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胃病，这是第一路军将士尽人皆知的事情。早在1935年，魏拯民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因病住进了莫斯科医院，经医生诊断，那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劝告他，患有这种病不宜在艰苦环境里工作，需要住院治疗。魏拯民置个人的生命于不顾，毅然地拒绝了医生的劝告，带着疾病返回长白山游击区。之后，由于环境不断恶化，生活条件极端艰苦，加之没有药物治疗，他的病情逐渐加重。据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伊俊山回忆，1937年下半年时，魏拯民有了一匹白马，平时行军作战他以马代步，但在心脏病发作时，连马也骑不了，只好由警卫排（特务排）的战士抬着或者

① 删节号为残缺部分，下同。

② 汉窑沟在安图县与抚松县北部交界处。

背着走。魏拯民的病情和董介南在信里自我讲述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董介南即是魏拯民在秘密通信时所采用的化名。

他和部队的关系

董介南在他的三封信中,有两处提到他和部队的关系。这也为我们解译董介南的身份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信息或证据。因为一个将领同部队之间的关系,最能说明他在部队中所处的地位。

董介南在10月1日给陆鸣一和马天一的信中写道:“我想离开其他同志,带领特务排的18位同志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去静养。”

这个特务排是负责保卫他安全的一个警卫部队,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那么,在抗联第一路军中,有哪些将领配有特务排或警卫排的呢?弄清这一关键问题,董介南的身份也就自然大白了。

根据已有的资料记载,在第一路军中,配有警卫部队的领导人仅有两位,即杨靖宇和魏拯民。然而,他二人的警卫部队在名称上和武器配备上又有很大的区别。杨靖宇的警卫排,通常叫做机枪排,因为它配备的武器主要是日本造的三八式歪把子轻机关枪,人数约二三十人,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是一支在肩负警卫任务的同时经常参战的部队。魏拯民的警卫部队则不同,它通常叫做特务排,人员较少,配备的武器主要是短枪,其任务是保卫和照顾魏拯民。当魏拯民病情加重难以行走时,特务排的任务就是抬着或背着他行军作战。据伊俊山、王传圣和宋茂璇等第一路军的老同志回忆,经常背伏魏拯民行军作战的人有两位,一是特务排排长、出生于琿春县的朝鲜族青年黄贞海,另一位是魏拯民的警卫员艾福荣。他二人都长得身高力壮,而且机智勇敢,曾经多次背着魏拯民脱离险境。配有一个特务排保卫,在重病中由这个特务排保护到某地去

休养,在抗联第一路军中,具有这样鲜明特征的人,除了魏拯民别无他人。这一点再次证明了董介南即是魏拯民。

同时,董介南在上述的同一封信中提到的关于三团长白山的问题,也充分证明了他就是魏拯民。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三团长白山同志仍无多大改变。由于他对队员采取谩骂殴打的方法,在中队长以下干部和队员中已失去了威信。在前次会议上对他进行了批评,现在虽然好了一点,但如果他不做彻底的改变,恐怕团长的责任是难以担当的了。”

这个三团为第一路军警卫旅第三团。警卫旅成立于1938年,由一、二军的两个教导团组成,下设第一、第三两个团,没有第二团,是第一路军总部直属的一支作战力很强的部队。1939年春天,杨靖宇和魏拯民率领部队攻克敦化县南部重镇大蒲柴河之后,总部一分为二,杨靖宇率领警卫旅第一团和少年铁血队等西去桦甸,魏拯民率领警卫旅第三团留在抚(松)北地区。这个第三团,实际上是二军教导团的原班人马,是魏拯民由东满带到长白山游击区的一支部队,一直在魏拯民身边并由魏拯民直接指挥。第三团的团长白山,本姓金,名叫白山^①。也叫金柏山,朝鲜族。他和第一团团团长宿惜仁并称为抗联第一路军的两员虎将。从部队的隶属关系和领导关系来判断,对于当时率队活动在安图(属于抚北地区)县境内的第三团团团长金白山,能够给予直接批评,并且提出“如果他不做彻底的改变,恐怕团长的责任是难以担当的了”的意见的人,在其时其地只能是魏拯民。这就再一次证明,董介南即是魏拯民已毫无疑义。

董介南化名的秘密

解译了董介南这个化名的身份,弄清了他就是长白山抗日游

^① 金白山于1940年7月17日投敌。

击区的创始人之一，与杨靖宇并肩作战的抗日英雄魏拯民之后，余下来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魏拯民为什么要采用“董介南”这个化名，在它的背后是否还有什么秘密或值得关注的故事。

是的，依据我对“董介南”三字的解释，在它的背后的确存在着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

董字显然是一个姓，南是个方位词，也就是南方，介是相隔或阻隔之意，连起来是：“和董相隔在南方”。

那么，这位董是谁？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为了使故事叙述得较为完整一些，我不得不把时空拉回到更为遥远的年代。

那是1933年，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哈尔滨的冬天。时任中共哈尔滨临时市委书记的魏拯民，在地包小市附近的住处被敌人发现，当天傍晚，他告别了房东那位善良的俄国老太太，声称要去大连做一笔生意，急忙赶往火车站。夜幕降临之后，他来到马家沟马家花园附近一座红砖房门前，按照预定的暗号，敲开了房门。迎接他的是一对年轻夫妇，男的名叫刘寿山，在铁路上做工，女的名叫董秀珍，夫妇二人都是反日大同盟的会员，一对坚定的抗日救国者。憨厚而忠勇的刘寿山拉住魏拯民的手说：“兄弟，从今后，俺就是你哥，她就是你嫂子，这里就是你的家。”魏拯民以表兄弟的身份，在这个家里受到了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无比关爱。

1934年清明过后，一场充满血腥的危难突发而至。由于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安仁和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胡彬被日本领事馆逮捕后叛变，日本侵略者在哈尔滨开始了大搜捕行动。魏拯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一天，刘寿山和董秀珍把他拦在家里，对他说：“好兄弟，你哪儿也不要去了，现在唯有在自己的家里最安全。你要听哥嫂的话。”他二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容他反驳，不容他拒绝，董秀珍抱起女儿小秋，拉着他风风火火地去照相馆照

了一张“合家欢”。第二天，一张放大的“合家欢”照片装在镜框里，由刘寿山亲手挂在西大桥附近一座住宅的正墙上。这对普通的夫妇，把保护一个救国者的生命安全视做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从此，在刘寿山的保护下，魏拯民和董秀珍一对假夫妻带着小秋在这里住了半年之久，安全地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期间，日本人的大搜捕从哈尔滨延伸到长春、沈阳、台辽和吉东等地区，近百名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者被逮捕或惨遭杀害。

1934年10月末，魏拯民奉命调往延边，出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临行前，他决定给远在山西省屯留县王村的父亲写一封信，在报告平安的同时，了断一桩萦怀已久的往事。1930年春，魏拯民从安阳军事学校回到家时，妻子张氏刚刚去世一个多月，父亲不顾他的反对，以长者的权威强行给他续订了一门婚事，并且强迫他立即完婚。对于这个从未谋面毫无感情基础的封建强制婚姻，魏拯民如何能接受，况且又是在悲恸的泪水未干、亡妻尸骨未寒之时。经过无数次争执，在无力改变父亲决定的情况下，他只好一走了之。如今，事过五年，他尽管远离家乡日夜奔波在抗日救国斗争的前线，内心深处依然被那桩婚事所困扰，因为他不愿意让一位无辜的女子为那个事实上已经死亡了的婚约而断送青春和幸福。他决定给父亲写信，就是要重申他的观点，说服父亲解除婚约，还对方以自由。

善解人意的董秀珍，对于魏拯民的思想行动早已洞察明了，在他苦苦思索不知如何落笔的时候，她把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合家欢”照片放在他的面前。她对他说：“把这张相片邮回家去吧，它会比你写多少信都管用的。”她又说：“咱们‘夫妻’一场，就留它做个纪念吧。”这天是1934年10月31日。一个月后，一封装有魏拯民和“妻子”、“女儿”合影照片的家书寄到了山西省屯留县王村父亲的手里。